



唐山 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唐山史 料 唐文 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山唐文资料整理组



唐山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教育史料专辑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2年5月

唐山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教育史料专辑之二

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唐山工程技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98 字数 17 万 印数 2000 册

冀出内刊字 JN—2021

主 编

魏兆环

特邀编辑

王士立

责任编辑

昊 天

目 录

教育天下计 委怀赤子心

——记无产阶级教育家杨秀峰 麻星甫(1)

著名教育家杨秀峰 刘绍友(17)

爱国教授杨十三 刘绍友(28)

唐山一中历史一瞥 路金声(35)

丰润车轴山中学史略 董宝莹(42)

乐亭一中的历史概述 葛辛坚(67)

丰南县的第一所职业学校 朱继经(79)

河北滦师八十年 唐向荣(87)

唐山市最早的企业中学

——私立开滦中学 王彦鹏(99)

冀东地区第一所女子完全中学

——私立培仁女子中学 王彦鹏(109)

迎接全国解放筹建路南建国分院..... 王 林(117)

革命的熔炉 培养干部的学校..... 李晓光(120)

追忆冀东革命中学..... 张书云(124)

隆隆炮声中的冀东解放区教育..... 桑伯清 整理(130)

烽烟漫漫的冀东区抗日民族教育..... 桑伯清 整理(141)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丰润教育..... 杨泽生(152)

一本有特色的农民识字课本..... 冯振祥 王彦鹏(157)

张文澜从教参政事略..... 刘秉中 整理(162)

一个爱国地理学家

——忆长兄万方祥

..... 万方琛 回忆 闫淑凤 整理(169)

刘秩升传略..... 赵竞存(174)

蒋秀峰和汇文中学..... 赵竞存(179)

河北唐中校长冯彬事略..... 么本瑞(186)

他为民族争光 他为未来铺路

——记原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

我和新民主主义教育

..... 曹枫衣 口述 杨玉平 王义军 整理(202)

教育天下计 委怀赤子心

——记无产阶级教育家杨秀峰

麻星甫

杨秀峰,1916—1921 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部学习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列主义传到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并席卷全国。此间,他因家庭困难而休学,在河北省滦县师范学校任课。当他得知五四运动的消息后,就带领滦师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宣传救国道理,震撼了县城,杨绍萱教授就是这时受到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①

从北京高师毕业,先后在江西鄱阳中学、直隶河间省立第三中学、通县省立第六女师、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执教历史、地理。无论在那所学校任教,都认真负责。教学方法运用自如,善于启发式,从不满堂灌。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当年在鄱阳中学读书的同学说:秀峰老师讲课理论联系实际,重视直观教学,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不仅深受学生的欢迎,连省府的督学也为之叹服。^②曾在河间中学受教于杨秀峰的刘皑风(原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回忆说:“他对教学工作严肃认真,有高度的责任感。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离开书本以渊博知识,简洁的语言,层次分明,生动活泼地进行讲述。”“更感人的是,他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关心学生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激励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非常热爱学生,

处处作学生的表率。”^③当年通县女师学生罗志英等谈起杨秀峰时,“杨老师讲课有方,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把史地课讲的活灵活现,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舞台上各色人物的表演;又像是在多娇的山川平原上驰骋,除饱览秀丽的风光之外,发现了我国有极丰富雄厚的各种资源。因此能使不爱听历史、地理课的同学,听得着迷,怕下课的铃声。听杨老师讲课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不拘泥于课堂教材,热心辅导课外活动。例如,他组织学生绘制历史、地理图表,举办展览。同学们通过自己的手,将祖国的山河分布走向、资源矿藏、气候雨量、交通、城市;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各朝的兴衰、农民的造反、外国的侵略等重大事件,跃然纸上,琳琅满目,挂满了两个大教室,这次展览除本校学生参观外,还吸引了通县其他学校的师生。这一活动,使同学们加深了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提高了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展览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引导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指导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1925年,他正在通县女师任教,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无比愤慨,向同学们讲述惨案经过、背景和掀起反帝运动的意义,并亲自领导了通县师生声援上海反帝爱国大会和游行示威,指导成立“沪案后援会”,在通县燃起了反帝怒火。^④不仅如此,他还两次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⑤,呼吁教职员“起来参加运动,作学生的指导者”,才算对得起天职,才是自尽国民一分子义务。

他在女师任教只有两年,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在要离开该校时,学生执意挽留,竟连续三天关闭校门,专人把守,唯恐他悄然离去,可见师生的情感之深。

二

1929年,杨秀峰赴法国巴黎大学社会科学院研习。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东方反帝同盟的负责工作。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因领导华侨和留学生在日本

驻法使馆前举行反日示威，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到比利时，仍领导反帝同盟工作。尔后，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由于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反对王明排斥异己，拒呼“王明万岁”，不屈服于王明的威胁，而被王明迫害，流放乌拉尔做工。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只手被炸伤致残。流放期满，先后到伦敦、柏林担负英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工作。^⑥

1934年10月回国，先后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授。开设了社会主义史、近世产业发达史、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政治史、国际政治、法俄革命史、政治经济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十数门课程。他奔波于平津之间，所授课程均从不同角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剖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应走的道路，指出革命者的责任，启发学生的觉悟。如通过法俄两国革命的比较，阐明十月革命的意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概论则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政治经济学概论则讲《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他论证精当，鞭辟入理，由浅入深，给人以启迪，娓声细语，扣人心弦，强烈地吸引着青年学生。许多外校学生也跑来听他的课，教室里坐无虚席，甚至教室外边亦站满了听众。

他讲课简明扼要，提供具有重要论断的篇章，以提起学生研究的兴趣，引导他们读更多的马列主义原著。仅在讲授社会科学方法论时，给学生开列的读物就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家族与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中外文书籍64种之多。^⑦如果自己不读很多的书，是难于推荐这些著作的，足以说明他的博学多识。

1935年5月，他在北平师大作了题为《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的学术讲演。他高屋建瓴，眼界开阔，用翔实的资料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作了系统的分析批判，使人耳目一新，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近代史研究》杂志曾于1984年重新刊载，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撰文推荐。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日寇进关，直逼平津，华北危机，平津危机！广大民众要求抗日之声日高。杨秀峰已不满足于在大学课堂授课，毅然走下讲坛，去实践所信奉的理论。首先到觉悟的青年学生中去，通过讲演会、时事座谈会、同乡会、政治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等种种活动，分析时局，针砭时弊，引导学生掀起救国运动。是年秋，他读到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即与北平、天津的进步教授黄松龄、许德珩、张申府、徐冰等人多次研究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并分头与各校联系。^⑧当北平学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之下，发动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在天津积极组织青年学生起来响应，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大游行，对联络各校学生的方法、游行的组织、路线、口号及注意事项等做了详尽的安排。他不顾个人安危，从始至终走在队伍的前列，对游行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指点解决的办法。制止了个别人想冲进日租界的冒险行为。游行之后召开群众大会，他提议成立天津学联和发表天津抗日宣言，大家鼓掌通过。他在向河北法商学院学生讲话中，称道他们“不愧为李大钊学兄的同学，继承革命光荣传统，还应发扬光大”。^⑨他还与黄松龄负责组织了“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⑩，于1935年12月19日发表《为北平学生运动宣言》，反对出卖华北，反对压迫民众运动，支持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号召以民族武装力量驱逐日寇出中国。

杨秀峰经常出席各校学生的时事座谈会，学联等学生爱国组织，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都乐于向他请教。他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在探讨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倾听大家发言，不时记下一一些问题，与同学们促膝而谈，解答问题时细声慢语，诲人不倦，直至弄明白为止。当时，学生运动面临如何发展下去的问题，学生们议论纷纭，他讲解了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去做。指出：掀起救亡运动代表了民族要求，是历史潮流，但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消除障碍。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应赶快准备抗日战争。学生是救亡运动的先锋，广大民众是救亡运

动的主力,先锋应与主力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学生运动指明方向。^①

以宋哲元为军长的29军驻守在平津河北一带,宋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后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二九”运动爆发之际,学生们喊出了“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冀察当局以木棍、皮鞭、水龙镇压学生,形成了爱国学生与29军短兵相接的形势。1936年春,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提出了争取宋哲元抗日策略,但不少学生运动骨干很难想通。为此,北平学联举行报告会,杨秀峰应邀前去讲演,他分析了日蒋之间及宋哲元与日蒋间的矛盾。指出争取宋哲元及其29军抗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他的分析透辟入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更多的学生骨干所理解和掌握。于是,学生们在天津的“五·二八”和北平“六·一三”游行中喊出了“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保卫平津”口号,宋哲元对此表示满意。在孟兰节为长城抗战烈士超度亡魂时,接受了学联的挽联。以后又接纳北平学生参观29军演习。过去的对立情绪已经冰释,学生们到29军宣传抗日受到欢迎。北平学联等学生爱国组织为争取29军抗日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激发该军官兵在喜峰口和卢沟桥奋起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②

1936年暑假,北平学生西山举办夏令营,对广大爱国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爱国教育。军警当局异常紧张,派出警察进行监视和干涉,扬言要予以解散。杨秀峰遂建议夏令营不妨带点灰色,以迷惑和麻痹军警。于是学联代表持他写的信件,请来了曾担任过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的张荫梧讲演,警察署长和监视学生的警察特务都惊呆了。从此,紧张的形势开始松动,夏令营活动继续办了下去,取得了成功。^③

杨秀峰以博雅学识和精湛的革命理论,给青年学生以思想启蒙,成为他们热爱祖国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他与爱国学生心心相连,休戚与共,赢得他们的崇敬,被称赞为“红色教授”。

他对马列主义有精深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实践家,一个战士,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誓言。1936年初,他和许德珩、黄松龄、张申府等人,团结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149名,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该会多次发表宣言和声明,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呼吁全国民众赶快团结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决心“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是时杨秀峰任该会党团书记,在文教界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文教界的学者教授,还利用上层关系营救被捕师生,组织营救“七君子”。以后又负责领导成立了“华北各界联合救国会”,扩大了统一战线,将各界民众的救国团体统一了起来。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深入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五四”纪念会上,反动教授陶希圣、吴葆三指使反动势力毒打爱国学生,制造了流血事件,又猖狂诬蔑爱国运动。杨秀峰挺身而出,在《晨报》发表义正词严的《致陶希圣的公开信》,揭穿了陶以宣传社会主义为招牌,而实际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伪善面孔,痛斥他制造分裂,挑拨离间,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同时,指导学联组织“五四事件受伤同学后援会”,进行合法斗争。一方面在报纸公开揭露陶;一方面向北平地方法院控告陶、吴。使许多人明了事实真相,反动势力陷于孤立。^[4]

杨秀峰在平津,冒着被搜捕和坐牢的危险,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反动势力周旋,以大无畏的气概,站在抗日运动最前列。“七七”事变爆发,他又为援助29军将士而奔走。

三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杨秀峰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抛下不满两岁的独生子,和夫人孙文淑一起,投笔从戎,率领一批平津等地的爱国学生,赤手空拳来到河北省西部井陉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创建冀西根据地,也称“师生抗日游击队”。此时形势险恶,困难重重,荆棘丛生。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政

权瓦解，社会秩序混乱。小股溃兵退聚山区，强派柴米，强行拉夫，打骂掠抢；封建会道门和地主民团乘隙蜂起，各据一方。他们有的与日伪勾结，充当汉奸，为虎作伥；有的沦为土匪，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杨秀峰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去争取溃兵、会道门、民团、大刀会等力量参加冀西游击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游击队就发展成为具有2000人的武装。其中有知识分子300余名，多数是经过“九一八”后抗日运动和“一二九”运动锻炼成长起来的，政治觉悟高，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才能，大都担任连队或营团军政领导人，这在当时的抗日队伍中是少见的，他们与红军干部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工作活跃，驰名河北。其后，派北上支队赴冀中，于平、津、保三角地区收编了两支仰慕杨秀峰声名的队伍。同时东出平汉铁路，参加了冀南根据地的创建。并吸引了几股对共产党存有疑虑，不愿参加八路军的抗日武装约3000人，前来投奔冀西游击队，愿在杨先生领导下进行抗战。

杨秀峰身为大学教授，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不怕艰难险阻，置生死于度外，献身民族解放战争的崇高精神，宽宏博大的气魄；礼贤下士、与人为善的品格，声望远播，在河北各界民众中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冀西、冀南、乃至冀中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间武装首领，络绎慕名投奔于杨先生麾下。使许多徘徊游离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力量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接受了党的领导。争取团结和改造了几千人的民间武装，成为能征善战的革命军队。从而巩固了根据地，健全了抗日政权。杨秀峰是执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面旗帜，成为冀西、冀南以至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公认的领袖之一。^[9]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年代，杨秀峰先后担任过冀西抗日游击队司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作用，无论负责军事工作还是负责政府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刚刚开辟冀西根据地，就指示成立妇女儿童教育部，恢复学校，编写教材，开办小学教师训练班，且亲自到班讲课。1938年初春，他要求“冀南各部门必须恢复学校、开办民间夜校，建设国防教育”，“培养大批军事、政治及民运干部”。为适应抗战需要，大量培养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各方面的人才。开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干部学校，团结和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了大批抗日干部。1938年5月，首先在冀中深县主持创办河北抗战学院，亲任院长。下设民运、军政两院。院址在原来一个中学和小学校内，原来学校的设备被国民党溃兵洗劫一空。他和师生们一起建设校园，清理瓦砾，修建操场，搭起席棚做课堂，睡的是谷草铺的地铺，每人每天5分钱菜金，1斤半小米。杨秀峰处处以身作则，毫不特殊，与师生共甘苦，穿一样衣，吃一样饭，每天和大家一起出操跑步，他提出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教学方针，采用学用一致和因材施教的原则，教师讲授与自学讨论相结合。他亲自上讲台，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受学员欢迎。许多平、津、保等地的流亡学生和冀中、冀南的爱国知识分子仰慕杨秀峰的名望，纷至沓来。学院办了两期，每期3个月，培养抗日干部2700名。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鲁冀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这些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输送到党、政、军、民各部门，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

同时，杨秀峰还极为重视学校教育。为冀南文教工作制订了实施方针：（一）积极实施农村统战文化教育政策，使一切文化与教育悉为巩固在国内团结，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服务；（二）发展小学教育，废除不必要的课程，改善管理制度与教育方法，教授抗日战争所必须的课程，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广泛发展农村民众教育，组织民众学校，提倡认字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四）创办报纸刊物，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认识，使之了解持久战之意义，坚定必胜信心；（五）运用各种宣传方式，教育民众参军参政，以奠定民主政治

之基础。他还强调因地制宜,办游击小学、流动小学、巡回小学等。纠正不要教育不要科学的错误观念。重视培养教师,关心教师生活,提高教师待遇。主张反对专制主义,实行民主的自由的教育政策;反对奴化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⑧

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根据地的教育得到很大发展。仅据1941年上半年68个县统计:小学已有7207所,学生达347266人。太行、太岳两区分别与战前比,增加小学338所,新建中学5所。1940年入冬学生人数有151251人。解放战争时期,针对一些“左”的倾向,他及时提出端正教育政策,整顿学校教育,确定统一的学制和课程。纠正了漫无学习标准和修业期限的游击作风,以求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文化水平。到1947年上半年,已建成具有文教、财经、医学、艺术等学院的大学一所;中学、师范30座,学生7172人;完全小学960座,学生144120人;初小38579座,学生2234000余人。冬学、识字班、民校村村都有。^⑨一个外国记者是这样描写他在晋冀鲁豫边区所看到的情景的:“我看到到处都有小学,山区有,平原有,大村有,小村也有,有的设在庙里,有的设在过去的地主大院里。”“不论走到哪个村子,到处能看到那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脚子,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的上冬学,或者在场院看乡村剧社的演出……”。他的客观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晋冀鲁豫边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

四

新中国成立之初,杨秀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兼河北师范学院院长。常到学校听课,指导学校工作。亲自邀请了不少在京津工作的专家学者到河北任职或兼职,参加河北省的建设。1952年调中央高等教育部主持工作,他主动提出让民主人士马叙伦先生任部长,自己做副部长,连续主持高教部、教育部达13年之久。为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开创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历尽艰辛。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善

于抓大事。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50年代初,不少高等学校的领导习惯于用搞运动的方式推动工作。对此,他一再指出:要办好教育,首先必须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工作对象是有思想的活着的人,“造就人”的事业是一个复杂过程,它的每一个循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整个过程需要稳定、有秩序、有节奏、有章法。教与学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应该循序渐进,质量的优劣不是短期能够看出来的。不能搬用搞工农业生产办法,更不能用搞运动、搞评比竞赛的办法。因而,学校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为教学服务”,其他任何工作不能冲击它,更不能代替它。50年代大搞运动时,他忧心忡忡地说:“前年是个大政治(系指反右派——笔者),去年是个大生产(系指“大跃进”——笔者),今年来个大军训,明年来个大文化,教育就办不成了!”随之,便到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纠正偏差,端正方向。他批评“劳动就是学习”的说法和劳动过多现象,是不要理论,不要理性知识,不要读书,拒绝用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是取消教育,纯属实用主义。

他一贯重视党对教育的领导。认为党的领导首先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从教育工作的特点出发,按照它的规律办事,不懂得教育规律就不能真正实行党的领导。他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能成为办好教育的业务专家,如教育家、管理专家等。他说学校教学质量好坏,是考察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志。教育工作就是思想工作,重要的是使师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思想工作应以鼓励为主,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启发自觉,切忌急躁粗暴、板起面孔训人。

那时,高校中发生了“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的论争。他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既是教学场所,又是研究机构,担负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既要出人才,又要出科研成果;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只搞教学不搞科研,教学质量无从提高;反